

# 宋代文化的生成背景及其特点

● 姚兆余

〔内容提要〕 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宋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活力,熠熠生辉。其原因除了与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文教政策有关外,最重要的还在于历史为宋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唐宋时期的社会变迁为宋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强劲的活力,国内民族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又为宋文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生成的宋文化,明显地具有过渡性、义理性、务实性、普及性、兼容性和整合性等特点。

〔关键词〕 宋代文化 生成机制 特点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1)01-0074-04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这样评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sup>①</sup>邓广铭先生也精辟地指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sup>②</sup>事实的确如此,宋代无论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本文试从社会变革、政府行为和民族融合等角度探讨宋代文化发达的原因,进而揭示宋代文化的若干特点,以就教于方家。

## 一、宋代文化生成的社会背景

第一,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是宋代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宋代,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双重因素的驱动下,汉唐时代的某些特征正逐渐消褪。首先,在政治上,汉魏以来影响中国达数百年之久的门阀政治彻底终结,以往那种由世家大族世代垄断政权的局面完全改观,封建政权的开放程度大大提高。与此同时,汉唐时期流行的门第等级观念开始被部分地抛弃,“取士不问门第,婚姻不问阀阅”<sup>③</sup>等等,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其次,在经济上,由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冲击,传统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走向崩溃,土地自由买卖的私有制进一步强化。适应生产关系的这种变化,宋王朝实行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地主阶级可以自在地购置田产,发展家业,私有个体经济的发展也有了较大的空间和自由度。再次,在人身关系上,唐中期以来“以钱谷定税”<sup>④</sup>的赋役制度的推行,使得生产者对国家和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获得了较大程度的解放。与此相表里,汉唐时期那种以人身束缚为特征的徭役、兵役征调和半农奴性质的部曲、佃客制也基本被废止,代之而起的是尊重当事人意志和自由的征役制度和募兵制度。……凡此种种,都预示着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的中世纪色彩正逐渐减褪,宋代社会处在中国封建社会转折的开端,进一步说,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成熟的顶端而逐渐下落、逐渐瓦解、逐步灭亡的转折时期,亦即“走出中世纪”的起步阶段<sup>⑤</sup>。

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迁,使这一时期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由此直接推动了宋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个体自由意识的强化,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学术文化上,人们不再笃守汉唐以来音韵注疏之学,掀起了一股“舍传求经”、“疑经改经”的学术思潮,最终导致作为宋元明清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理学的产生。在世人心态上,随着门阀政治的彻底终结,那种依靠门第、血缘、身世进入统治集团的选官标准也逐渐被淘汰,重视个人才能,依靠个人奋斗而出人头地,成为当时人们普遍的心态,“一切以程文为去留”<sup>⑥</sup>的科举考试制度,正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势而得以确立、发展和完善。在民俗文化上,商品经济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富裕阶层,这些人凭借自身经济实力,向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居室制度、丧葬制度发起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逾僭之举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其二,价值观念的更新。与汉唐时代推崇重义轻利、热衷空疏思辨之学相比,这一时期人们开始摆脱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追求实际,注重实用,讲求功利。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思想犹如一股强大的浪潮,在宋代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澎湃涌动,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社会风气都产生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影响。宋代科学技术取得的辉煌的成就就是有力的证明。

其三,社会观念的变化。汉唐时代的门阀政治往往造成政府官员过分注重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对国家和社会的前途命运较少关注,对人事民瘼更是无动于衷。而宋代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们虽然缺乏门阀政治体制下那种稳定感和安全感,却在严格的考核制度下增添了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这一时期士大夫们普遍恪守的信念。

其四,文化结构的变迁。唐宋时期社会变迁的最终结果,便是平民社会的到来。与之相适应,反映平民社会的文化也随之诞生。典雅、精致的唐诗向通俗、平易的宋词转变,

无疑是平民文化兴起的体现;新道教、理学、禅宗鼎足而起,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这一时期平民文化的新发展;至于市民文化的勃兴,更是为了适应城市中市民阶层的精神需要。这种生长于瓦舍、勾栏中的文化,是一种节奏明快、格调粗俗的新型文化。它的产生,不仅引起传统文化结构的内在变革,而且为明清之际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宋朝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较为开明的文化政策,为宋代文化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尊孔重儒。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世风败坏、文化失序的状况,在推行“稍夺其权、收其精兵、制其钱谷”三大政策,消除武将专权、藩镇割据等隐患的同时,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sup>⑦</sup>的治国方略,尊孔崇儒就是这个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宋太祖登基伊始,就诏令有司增葺开封文宣王庙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师之像,并亲自撰文颂扬孔、颜。太宗即位第三年,召见孔子后裔孔宜,“问以孔氏世嗣,擢右赞善大夫,袭封文宣公”<sup>⑧</sup>,并蠲免孔宜家庭的所有赋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又下诏重修曲阜孔庙。真宗即位后,对儒家思想倍加推崇。咸平四年(1001年),诏命邢昺、孙奭等校订《周礼》《公羊传》等七经疏义。所有这些活动,对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无疑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为赵宋王朝营造了一种文明、理性的立国气象。

在尊孔的同时,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儒士的选拔和使用。发轫于隋唐时期的科举取士制度,在这个时期成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宋朝统治者不仅将考试内容固定化,考试规程完善化,而且放宽应试对象,取消了隋唐时期对考生的身份限制,工商异类和僧道归俗之徒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与此同时,逐渐扩大录取名额。太宗时开科8次,登第者达7000人;真宗时开科9次,取士5200人;仁宗时开科13次,取士超过万人。这种开明的取士政策,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阶层读书入仕的热情,不仅推动了文化的相对普及,而且使诗赋经义之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2) 思想言论较为自由。宋朝统治者以不流血的方式建立了政权后,在政治上采取了很多文明和理性的做法,如“不以文字罪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sup>⑨</sup>等等,从而影响着宋代的生活向着相对宽松自由的方向发展,形成了“与士大夫治天下”<sup>⑩</sup>的政治格局。这不仅有助于士人们施展才智、阐发见解,自由争鸣,而且有助于士大夫们走出传统的诗文章句之学的牢笼,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明。可以说,宋代学术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就是宋代政治运作文明化和理性化的直接结果。

(3) 兴建学校。宋王朝建立了一个以中央太学、国子监为中心,诸多专科学校及地方府州县学成龙配套的教育网络,并且制定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管理体制。宋代中央官学科目设置之多、生员来源之广远为唐代所不及,地方官学办学率之高、管理法制之完备更是史无前例。如宋代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几乎是“虽荒服郡县必有学”<sup>⑪</sup>,其数量和密度均达到汉唐以来的最高水平。在经济相对落后岭南地区的广南东路、广南西路,在宋代就有39所和53所府县学,即使

是荒僻的海南岛上也建有12所学校。

宋代民间私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宋政府往往采取因势利导的政策,以较为宽松的态度来对待民间教育,通过赐书、赐田、赐钱等方式对民间私学加以支持,对个别施教有方、德学高尚的名师硕儒还封官授职,予以表彰。宋政府通过各种措施,将私学逐渐引入官学的轨道,使之成为官学的有益的补充,这是宋代文化教育的重要特色。

(4) 重视文化典籍的搜求和整理工作。发展文化事业必须重视文化典籍的搜求和整理工作。宋朝立国之初,藏书十分有限,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sup>⑫</sup>,“其后削平诸国,收其图籍,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三馆之书,稍复增益”<sup>⑬</sup>。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建崇文院,“徙三馆之书以实之”<sup>⑭</sup>。徽宗时编撰《秘书总目》时,总卷数增加到55923卷。然而,这批卷帙浩繁的藏书在靖康之难中“荡然靡遗”。此后,经过南宋政府的苦心搜求,图书典籍收藏数量逐渐恢复到北宋时的水平。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编撰《中兴馆阁书目》时,总卷数达44486卷。至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编撰《中兴馆阁续书目》时,又增加了14943卷。至此,南宋藏书总量达59429卷。此外,由于雕版印刷业的发达,民间书院和私人也大量藏书。藏书事业的发达,为宋王朝整理文化典籍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宋代四大类书的编撰和官私史书、方志的编修,无疑得益于政府和民间丰富的藏书。

第三,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交融,为宋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蓬勃生机。

两宋时期,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这两种不同质地的文化,在长期的碰撞交融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从而使宋代文化明显地带有文化“杂交”的色彩。这种文化杂交所产生的优势,是宋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源泉。如在民俗文化上,北方游牧民族的种种习俗相继渗入汉文化系统内。以服饰为例,汉人服饰“胡化”现象在宋代非常突出,尤其是在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密集地带的华北和中原地区,这种现象更是司空见惯。北宋时,契丹服饰在东京城内十分走俏,“士庶仿效胡人衣装,裹番样头巾,着青绿及乘骑番鞍辔,妇人多以铜绿兔褐为衣”<sup>⑮</sup>。南宋时,中原地区百姓服饰“胡化”趋势更加明显。乾道六年(1170年),范成大出使金国时,目睹中原百姓“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女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玑瑱冒之,谓之方髻”<sup>⑯</sup>。与北宋时期的服饰习俗迥然有别。除此之外,北方游牧民族的某些生活用品和风物土产也传入汉人世界里。如西瓜由契丹族从西域引进后,至辽、金之际也传到中原和南方地区。女真族饮食起居用的火炕,随着女真人南迁也传入华北和中原地区,相沿使用,至今不衰。凡此种种,均表明宋文化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汇融合的结晶。

第四,外来文化的介入,丰富了宋文化的内涵

宋朝统治者对外来文化基本上采取兼收并蓄、广纳博采的政策,无论是精神文化,还是物质文明,只要有益于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完善,都一概加以引进和吸收,从而使不少外域文化的因子进入汉文化系统中。如在科学技术方面,宋代科

技高峰的形成,与阿拉伯、印度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进入显然有着一定的联系。在数学上,阿拉伯国家的代数、几何、三角、历算等数学成就,广泛地被宋朝数学家吸收和采用。

在物质文化方面,异域物产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龙脑、乳香、云母、阿魏、五味子、黄连、血竭、没药、白芷、象牙、珍珠等药物大量输入,增加了宋代药物的品种;越南占城稻、高丽的“黄粒稻”等优良品种的引进,改进了宋代水稻的品种;番椒、西红柿、西瓜等引进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饮食生活;高丽的白磁纸和松烟墨在宋朝享有很高的声誉,日本的折扇和倭刀也深得宋朝文士们的好评。

由此可见,宋代文化的辉煌成就,离不开对外来文化的汲取和容纳。正因为宋王朝善于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以充实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才使得宋代文化更加完善和丰满。

## 二、宋元文化的特点

在社会变迁与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中生成的宋代文化,明显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过渡性。如前所述,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由成熟走向解体、由繁荣走向衰败的转型时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生成的宋文化,必然包含若干“近代”的因素。如平民文化就是宋代社会中带有“近代”色彩的文化现象。

平民文化的兴起,是与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的。相对于传统的贵族文化而言,平民文化虽然比较稚嫩、脆弱,但发展势头十分强劲、迅猛,在政治、社会、学术、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均有着深深的印记。

随着官方教育机构对平民阶层的开放和民间私学、书院的兴起,士农工商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并出现了一大批以教育为职业、不以科举仕进为目标的平民学者阶层。

在“取士不问家世”的社会环境中,大批平民子弟进入统治阶层,参预社会管理工作。反映士农工商利益和要求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空前活跃。如李觏、范仲淹、陈亮、叶适等人的重农或重商思想,显然属于平民文化的范围。

精彩纷呈的小说、戏曲、杂剧和百戏,丰富了城乡居民的文化生活。

这几点,只不过是宋代平民文化兴起的一些剪影。在平民文化的猛烈搅动下,汉唐以来贵族文化独尊一统的垄断格局开始走向解体,至明清之际,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促动下,平民文化终于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雅俗文化并存的格局最终形成。

第二,义理性。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基础上产生的理学,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进行了解释和论证,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渗透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宋代文学创作、史著撰写、社会生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在文学创作上,宋诗尚理,已成为千古定论。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就有“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之论,刘克庄也认为“近世理学兴而诗律坏”<sup>①</sup>。这些言论,虽然主旨在于批评宋诗,却也道出了宋代理学对诗歌产生影响的这一事实。大体上说,理学对宋代文学创作有这样三方面的影响。

首先,理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主张“宇宙之间,一理而已”<sup>②</sup>,并明确地指出“格物穷理”是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交融这种精神境界的方法。这种重理穷理的思维方式,与诗歌创作中既要明究常理,又要形象表现的艺术思维有了契合点和一致性。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成为宋代诗歌创作的重要准则,议论成为宋代文学创作的重心。其次,理学倡导一种物我交融、“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sup>③</sup>的精神境界,对宋代文人们提高涵养、修身养性产生了导向性作用。在这种境界的影响下,宋代文人们一反唐代文人那种注重事功、崇尚俗务的风气,追求个体人格的自我完善,从而形成达观处世、随缘自适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又直接影响宋代文人们的创作基调和创作内容。宋人诗歌具有平和、超脱、潇洒和悠然的风格和特点。最后,随着理学的普及和推广,对宋词创作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不但强化了宋词的哲理意识,而且促使词作向高雅化方向发展。

在史著撰写上,由于受理学思潮的影响,宋代史学出现了义理化趋势。举其要者,一是史论、史评空前发达,如胡寅的《读史管见》、张栻的《通鉴论笃》、陈傅良的《两汉博议》、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叶适的《唐史评》等,都是用理学思想作为评判史事的标准和尺度,从而将历史问题上升到哲理的高度来认识。二是提出了“史以明理”的思想,“治史以治世”成为宋代史家们的普遍信仰。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到朱熹的《通鉴纲目》,无不贯穿着这一崭新的治史原则。

在社会生活上,既然“三纲五常”是处理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那么,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就必然完全贯彻到社会生活中。在这方面,朱熹用心最苦,用力最勤。他针对五代以来“礼崩乐坏”、“衣服无章,上下混淆”的失序状况,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古代服饰和礼仪制度。他不仅制定了一套长幼有序、贵贱有等的《家礼》,作为家族生活的行动指南,而且推而广之,为朝廷“宗祭祀、冠婚之服”<sup>④</sup>。当然,朱熹并非泥古不化,他对社会变革所引起的家族结构和民情习俗的变化也有清醒的认识,“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庐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sup>⑤</sup>,因此,他在制定新的礼仪、服饰制度时,采用不少变通的办法,对古制加以革新,以适应士庶阶层的需要。《朱子家礼》正是由于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才能够在元明清时期一直被奉为家庭礼仪的圭臬。

第三,普及性。宋代文化的普及性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是文化的空间扩展。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征程的驱动下,中原文化迅速地南移北渐,不仅促成中国南部地区文化的发达,而且引发了北部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深层汉化。另一方面,与宋代社会发展大趋势相一致,以往为世家所垄断的文化开始向社会下层移动,社会下层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如“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sup>⑥</sup>;“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sup>⑦</sup>,“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傭妇,亦能口诵古人言语”<sup>⑧</sup>等记载,都反映出一些地区下层平民素质提高的状况。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下层平民主体意识开始觉醒,如平民阶层在衣冠服饰和(下转封三)

# 二〇〇〇年西北史研究会年会在西北师大召开

2000年12月22日,二〇〇〇年西北史研究会年会在西北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西北师范大学、甘肃省委党史办、甘肃人民出版社、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民族研究所、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甘肃省委党校文史教研室等单位的35位西北史研究会会员参加了会议。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办这次年会。文学院副院长田澍主持会议,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邓华林、科研处副处长杨琪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词,祝西北史研究会2000年年会圆满成功,并希望西北史研究会在西北史研究方面取得更多成果。西北史研究会会长、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郑炳林发表讲话。他认为西北史研究会的专家、学者应该申请一些有关西部大开发的重点科研项目,推动西北史研究进一步发展。西北史研究会秘书长、西北民族学院马列部主

任贾东海教授总结了2000年西北史研究会的工作,提出举办西北史专题学术会议、出版西北史研究论文集为2001年西北史研究会的主要任务。与会代表们纷纷介绍了有关西北史研究的观点或汇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生冯培红汇报了题为《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魏晋南北朝隋唐职官制度》的国家社科规划青年项目进展情况;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王继光认为应该采用田野调查法和历史资料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去研究西北史。甘肃省考古所办公室主任赵雪野汇报了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甘肃省文物考古地图集》的研制情况。认为这一考古地图的出版,必将为甘肃省考古、旅游业提供便利条件;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宝通介绍了西北师范大学简牍学硕士点的建设情况、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徐黎丽)

(上接第76页) 居室宅第上“僭越”礼制,平民子弟参预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的愿望日趋强烈,追求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有所萌动,所有这些,无疑是社会整体文化素质提高的外在显现。

第四,兼容性。在各民族长期军事冲突和较量过程中,既有北方少数民族移居内地,也有大批汉人迁移到少数民族地区。中原农耕文化、北方草原文化、边疆各族文化等等都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有效的交流,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宋文化的内涵,使宋文化在弃旧图新、广纳博采中更加成熟和完备。可以说,宋文化就是多种多样、形

形色色文化兼容并蓄、调适整合而形成的。这一特点,在科技文化和民俗文化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前文中已有涉及,此处不复赘述。

以上所列,只是宋代文化特点之大要。除此之外,宋代文化尚有整合性、务实性等特点。前者主要指外来文化和异族文化在相互调适中走向融合,如汉文化的胡化等等,这种变化已不只是文化因子的积聚和汇合,而是在文化内核上相互渗透和融合。后者主要指宋代文化求适用、重功效。正是由于上述这些鲜明的特点,才使得宋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独领风骚,熠熠生辉,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注 释:

- ①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
- ②邓广铭:《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 ③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一》。
- ④《新唐书》卷51,《食货志》。
- ⑤参阅王育济:《理学·实学·朴学》第7页,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版。
- ⑥陆游:《老学庵笔记》卷5。
- 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
-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太平兴国三年十月。
- ⑨陆游:《避暑漫钞》。
- 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
- ⑪吕祖谦:《宋文鉴》卷82,《南安军学记》。
- ⑫程俱:《麟台故事》,拾遗卷上,《书籍》。

- ⑬⑭《宋史》卷202,《艺文一》。
- ⑮《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三之六。
- ⑯范成大:《揽轡录》。
- ⑰刘克庄:《后村行生大全集》卷98,《林子显诗序》。
- ⑱朱熹:《朱文公全集》卷70,《读大纪》。
- ⑲《四书集注·论语·先进篇》。
- ⑳《宋史》卷153,《舆服五》。
- ㉑朱熹:《朱子家礼·序》。
- ㉒叶适:《水心集》卷9,《汉阳军新修学记》。
- ㉓傅陈良:《止斋文集》卷3,《送王南强赴绍兴签幕四首》。
- ㉔方大琮:《铁庵集》卷33,《永福辛卯劝农文》。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责任编辑:汉 河;校对:叶 子